

情报术

(美) 艾伦·杜勒斯著

胡家伟译

(内部发行)

群众出版社

情 报 术

(美) 艾倫·杜勒斯著

胡家偉譯

(內部發行)

群 众 出 版 社

1964 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艾倫·杜勒斯是美国特务头子，从事間諜工作达四十五年之久。他一直負責国外情报工作。1951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53年任局长，1961年退休。这本书是他退休后写的。书中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国外所进行的顛复破坏活动极力掩飾和辯护，对于“自由世界”的所謂“民主”、“自由”倍加吹噓。我們稍加刪节后譯出，仅供領導同志和有关单位了解和研究美帝国主义在国外进行間諜特务活动的参考。

ALLEN DULLES THE CRAFT OF INTELLIGENCE

本书根据美国哈潑斯月刊 (Harper's Magazine)

1963年4月号譯出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内部发行组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书号(总)211(社)46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 7/8

1964年11月第1版 1964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68 千字 定价 (4) 0.38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 一、我的简历…………… (1)
- 二、什么事情需要保密…………… (3)
- 三、导弹时代的情报需要…………… (5)

第 二 章

- 一、历史的教训…………… (9)
- 二、美国历史上的教训…………… (11)
- 三、赫鲁晓夫的国外耳目…………… (14)
- 四、纯粹的苏联人…………… (18)
- 五、间谍的特权…………… (20)

第 三 章

- 一、公开的情报工作…………… (22)
- 二、秘密的情报工作——间谍活动…………… (25)
- 三、打进去——“安钉子”…………… (26)
- 四、训练“冒名顶替者”…………… (30)
- 五、拉出来…………… (31)
- 六、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内向往西方的“志愿人员”…………… (34)

第 四 章

- 一、利用現代化科学技术进行情报工作…………… (38)
- 二、利用 U—2 飞机…………… (39)
- 三、偵听…………… (40)
- 四、破譯密碼的工作…………… (41)
- 五、拆閱正人君子的信件…………… (42)
- 六、切勿把破开敌人密碼的事泄露…………… (43)
- 七、破譯外交密碼…………… (44)
- 八、情报工作的指揮…………… (45)
- 九、自由的社会和不自由的社会…………… (48)

第 五 章

- 一、反間諜工作…………… (51)
- 二、渗透法…………… (52)
- 三、挑撥法…………… (54)
- 四、逆用手段…………… (55)
- 五、外綫監視…………… (57)
- 六、策反工作…………… (58)
- 七、迷惑对方…………… (61)
- 八、設計騙局…………… (63)
- 九、轰炸机繞圈子飞行…………… (64)

第 六 章

- 一、如何分析、判断和整理情报，
 力求把正确的情报及时送給領袖…………… (68)
- 二、鴨綠江、苏伊士运河、猪灣…………… (73)
- 三、并不純粹是一門科学…………… (75)

四、如何对付共产党的颠覆活动.....	(76)
---------------------	------

第 七 章

一、中央情报局的性质.....	(79)
二、总统的责任.....	(80)
三、审查和报告制度.....	(81)
四、缄默贵如黄金.....	(84)
五、献身之所.....	(85)

第一章

一、我的簡历

我很早就对世界事务感兴趣了，童年时代就孕育着这种兴趣的萌芽。早年，我祖父从波士頓到印度馬德拉斯去傳教，乘帆船航行一百三十一天，途中历尽艰險，几乎失事遇难；他这个惊險的航海故事给了我深远的影响，我可說是沐浴在这个故事的气氛中从小长大的。我的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是和我的外祖父母在华盛顿度过的。我的外祖父約翰·W·福斯特 (John. W. Foster)，1892年在哈里逊(Harensen)总統任內作过国务卿。他在內战中服役后被擢升为將軍，以后又曾出使墨西哥、俄罗斯和西班牙。我母亲的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是在这些国家的首都度过的，我父亲也在外国上过学。我就是在这个經常議論国际形势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我最早搜集的是西班牙和南非战争的材料。1901年我八岁的时候，每当祖父和他女婿、后来在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总統任內作过国务卿的罗伯特·兰辛 (Robert Lansing) 热烈議論英国和南非战争的功过得失时，我就貪婪地倾听着。我别字連篇地写下了自己潑辣的看法，这些看法受到了长辈的賞識，并把它印成了小册子；而这本小册子在华盛顿地区竟成了“暢銷书”。在这本小册子里，我是站在“失敗者”一边的。

大学毕业以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个月，由于对当时迫在眉睫的这场大战还和一般人一样茫无所知，我开始了我的环球事业旅行，先是在印度、然后在中国教书，还在远东地

区作了一次广泛的旅行。1915年我回到美国，在美国参战前一年开始进入外交界服务。

其后十年，我陆續在一系列饶有兴趣的岗位上工作。首先，1916—17年，我在奥匈帝国目睹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开始崩溃。美国参战时期，我在瑞士搜集德国、奥匈帝国和巴尔干战线的敌后情报，事实上，我当时与其說是个外交官，倒不如說是个情报官。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討論凡尔赛和約时，我参与划定了新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界，并且参与研究俄国革命和中欧的战后和平安排問題。和会结束后，美国于1920年在柏林派駐了战后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我是这个使团的成員之一。到君士坦丁堡作过一次业务旅行后，我在国务院担任了四年的近东科科长。

那时，1926年，我对世界的好奇心虽然还没有衰竭，可是錢包却空了，于是轉而执行律师业务；其間又曾出任公职，在国联限制軍备會議上担任美国代表团的法律顧問。在这次工作中，我見到过希特勒、墨索里尼、李維諾夫以及英法的領袖。

1941年，当战争威胁美国的时候，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D·Roosevelt）总统召威廉·杜諾万（William·J·Donovan）上校（以后晋升少将）到华盛顿，要他組織一个綜合性的情报机构。彼尔*·杜諾万，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情报局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被称为美国現代情报工作之父，我觉得是可以当之无愧的。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他要求我参加他的工作，从此我就一直跟他在一起，直到对德、对日战争結束。

在这緊張的四年里，我主要是在瑞士工作，德国投降后又在柏林工作。我信奉通过研究具体案例以熟悉业务的方法，当时我在这方面也确实下了一番苦功。日本投降后，我于1946年重操律师旧业。但这并未妨碍我积极参与制訂建立中央情报局的正式立

* 彼尔是威廉的略称。——譯注

法程序。

1950年11月，中央情报局当时的局长华尔特·貝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ll Smith)將軍召我到華盛頓。我去的時候原以為只需要呆六個星期，不料以後在中央情報局竟一直工作了十一年。

二、什么事情需要保密

我在中央情報局工作了十多年，後八年擔任局長，1961年11月退休。退休以來，我就覺得，現在正需要有人——哪怕是與情報工作有切身利益關係而又積極支持情報工作的人——來講一講：情報工作，作為現代政府結構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究竟有哪些事情是可以適當公開的。在所有各種職業中，為人了解最少而訛傳最多的，恐怕就是情報工作了。

肯尼迪總統於1961年11月28日主持中央情報局新廈落成典禮和與我告別時所說的一番話，很好地說明了為什麼需要有人來這樣講一講的一個理由。他當時說：“你們的成績不出門，你們的過失傳千里”。道理是明擺着的：進行得順當的工作你不能宣傳，搞糟了的工作你不宣傳它也會不脛而走。

中央情報局並不是一個地下組織。要想對建立這個機構的宗旨獲得一個概念，只要讀一讀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就行了。它當然有它秘密的一面，法律也允許國家安全委員會——它實際上代表總統——責成中央情報局在法律特別載明的職務之外担负某些其它的情報工作任務。這些任務是不公開的，但國務院和國防部對他們的大部分工作同樣也是嚴格保密的。

中央情報局的經費由國會批准的專門預算支付。它的總數和每個時期的開支，國會撥款委員會的中央情報局小組委員會是知道的。由於總數不公布，許多寫這方面文章的人就覺得有權自行猜測。由於十億美元是個很好的整數，這個數字一般也就成了他

們派給中央情报局的預算开支数，但这个猜测数与实际情况毫不相干，我作局长时的实际总数多少要比这个誇張的猜测更使美国納稅人高兴一些。

当我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在情报工作上，我的指导原則之一就是：只有那些确实需要保密的事情，才應該尽一切可能确保其机密，常識性的事情和敌友都同样了解的事情，則用不着神秘化。

我担任局长后不久，就遇到这样一件事情，足以很好地說明这种神秘化作法的害处。总统的兄弟密尔頓·艾森豪威尔 (Milton Eisenhower) 博士有事来找我。总统也想到我的机关来看看。他們出发了(事先并未通知情报局)，可是找不到我的机关，最后只好給我打电话問明詳細地址。当时中央情报局总部大門上的招牌是“政府印刷所”。游覽汽車在环游华盛顿时都习惯于在我們的大門前停下来。然后向导就向游客大声演說，宣称在这带刺铁絲网的后面，就是华盛顿最秘密、最隱蔽的地方，美国間諜机关的总部——中央情报局。我还发现，华盛顿的出租汽車司机几乎都知道这个地点。后来我在大門口换上适当的招牌，吸引力和神秘色彩就随之消失。对于首都的訪問者來說，我們既不再是不祥的，也不再是神秘的了。过份的保密等于自欺，一如过多的言談招致危險。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杜諾万將軍和战略情报局于1942年11月派我到瑞士，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足以說明一定程度的公开反而有利于搜集情报。我当时的掩护职务是美国外交使团团长助理。但瑞士一家大报却报导我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秘密使节。心中无底的人也許会想，这篇胡謔的意外广告可能把我的事情搞坏了。但事实恰好相反。尽管我老老实实在适当否认了这篇报导，人們可还是相信它。結果，一大群送情报的人聚集到我周圍来了。当然其間不免魚龙混杂，有真有假。我如果不能从中基本上分清真偽，那就是不称职了。因为，情报官員的基本

能力之一，就在于識別人物。

三、導彈時代的情報需要

國務院和國防部都從國外搜集情報，他們的專家分析這些情報，提出報告，進行許多有關的工作。事情是否整個作完了呢？否，政府的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早在十五年前就都對這個問題作了否定的回答。理由是，共產黨的威脅和它的那一套什麼都保密的作法，它為了準備核火箭威脅和對自由世界進行顛覆活動而搞的一些措施，都已經越來越厲害了。

蘇聯和共產黨中國的廣大地區對外都是不開放的。他們決不會輕易地把他們的軍事設施情況告訴我們，而這些情況又正是我們和自由世界的防務所必需知道的。到目前為止，他們還一直拒絕限制軍備和核軍備的基本點——視察和監督。他們公然宣稱，保密是他們的本錢，是他們政策上的基本要素。他們宣稱他們有權秘密武裝，以便在他們需要時能夠發動秘密襲擊。他們輕率地拒絕了艾森豪威爾總統 1955 年提出的開放領空的建議，那個建議，只要他們實行，我們也是準備實行的。這樣一來，就給情報機關帶來了一項平衡情報差額的任務以及為此而必須進行的準備工作的任務——刺透他們的保密盾牌。

國務院和國防部公開的情報搜集工作固然有很大價值，但還不夠。需要有秘密的情報工作和獨特的專門技術來刺透共產黨集團的公安壁壘。

我們防范突然襲擊最保險的辦法，就是有一個經常保持警戒、能夠準確迅速地報導世界上幾乎任何地方的動態的、嚴密而協調的情報工作機構。今天的世界性質說明了我們的問題。一二十年以前，誰敢設想六十年代我們的武裝部隊會深陷於越南和朝鮮，古巴會變成一個與莫斯科親密結盟的敵對性的共產黨國家，而剛果又

会在我們的外交政策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可是这一切全是今天活生生的事实。未来的岁月无疑也会出现同样意外的事变。

因此，我們搜集情报决不能只限于搜集当前发生危机的国家的情报。我們需要的是全球情报。在这个核火箭时代，甚至南极和北极也成了重要的战略地区。距离和时间已經大大失去意义。海洋，过去保卫过我們，在决定性的时刻，例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在防务上給了我們时间，現在，海洋仍然存在着。然而我們今天却处于前綫；我們今天成了主要目标。一次突然襲击并不需要一次帶有明显暴露迹象的長時間动員。導彈在发射台上，轰炸机处于待命状态中。

我們的防务需要就是这样，我們不能等到另一个强国决定进攻我們之后再着手搜集敌对行动的情报。我們必須尽力保持警惕和作好戒备。

除了在世界範圍內搜集情报之外，另一个問題就是如何处理和分析这些情报。我认为，由一个不对政策負責的政府情报机构担負提出情报分析意見和协调情报分析工作的主要責任，是有好处的。政策制定者十分自然地傾向于陷在他們負責制定的政策框框里。而偏見正是情报工作中最严重的职业性危害。

珍珠港事变前，國內外的高級官員都认为，日本人如果发动进攻，必然是南下攻取英国、法国和荷兰殖民地的下腹部。人們沒有考虑日本人对他們最危險的对手——美国开始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珍珠港事变，以及当时对已有情报的处理失当，大大地加强了我們政府以后更好地組織情报反映工作的决心。事先接到的警告虽然可能不够明确，不足以使我們的領袖精确地断定問題將出在夏威夷和菲律宾，但是，只要他們对情报加以适当的分析，至少也可以使我們对太平洋上临头的威胁保持警戒。至于日本，襲击珍珠港固然成功了，但事实证明那是他們最大的失策。

如果有任何人对客观性情报的重要性有任何怀疑，我願意提

供历史上的其它錯誤事实来加以研究。这些錯誤，都是由于領袖們考虑不周或者对情况及其它国家的态度判断錯誤而造成的。1914年凱撒·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进攻法国时，他的軍事領袖們力图使他相信，要取得軍事胜利就必须侵犯比利时的中立，他过于相信他們的判断，认为英国不敢参战——尽管他已經从政治方面接到过这样的警告。这是情报鉴定上的一次重大錯誤。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政府由于不听丘吉尔的警告，終致对納粹威胁的严重程度、特别是空襲的严重程度失于戒备。

同样，希特勒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犯了一系列錯誤。他沒有估計到美国的力量和决心；后来在1941年6月对俄国开辟第二战場时，又漠視了这样作的后果。据說，1942年有人向他报告过英美的北非登陆計劃，他拒絕考虑这个对他有用的情报。有人告訴我，他当时曾經冲口而出地說了一句：“他們沒有船只登陆”。

一种新的、在共产党革命之前实际上无人了解的威胁，給我們的情报工作增加了一項額外的重担。这种威胁就是共产党破坏自由国家安全的阴谋，这一点，我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了解的。由于这种阴谋活动是在暗中进行的，我們就必须有秘密情报技术来揭露它，并且建立我們自己的防务来对付它。

在苏联，我們面对着的敌手把間諜艺术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同时把从属于它的破坏方法和欺詐方法发展成为一种可怕的政治攻击工具。再沒有別的国家曾經打算把間諜工作搞到这样大的規模了。为苏联国策所支持的这些活动，無論是在所謂和解与共处的姿态下，还是在尖銳的危机时期中，都同样积极进行着。这种敌对活动是我們和我們盟国面临的共同威胁，在消除这种敌对活动的工作中，情报机关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責任。

近来，在几个北大西洋条約国家破获了許多苏联間諜案件和破坏案件，这决不是偶然的。世界正應該了解苏联人已經了解了

的事情——自由国家已經建立起高度成熟的反情报組織，而且近年来在偵破苏联間諜活动上越来越有效了。当然，在某些共享秘密的国内保安措施上，我們和北大西洋条約盟国以及其它盟国有着共同的直接利益。如果一份北大西洋条約組織的文件被共产党人从我們的盟国之一窃走，那对我們的危害无異于从我們自己的档案中偷走。这种情况，使国际合作成了情报工作中一种必不可少的要素。

我們的盟国以及許多友好的但未正式結盟的国家，对共产党威胁的看法一般是和我們一致的。許多国家都能够并且正在对自由世界的整体力量作出实际貢獻，包括情报方面的貢獻，以帮助我們保持警戒。当然，我們有些朋友沒有条件作到他們可能想作的一切。他們希望，在情报工作方面，一如在許多其它方面，能得到美国的領導。當我們破获共产党的敌对計劃时，他們希望我們幫助他們弄清對他們自己安全的威胁。我們当然也有兴趣这样作。近来情报工作最令人鼓舞的特点之一，也是情报工作史上独一无二的特点，就是美国情报部門和自由世界各国同行之間日益增长的合作，它使我們同命运共呼吸，因為我們面临着共同的威胁。

第二章

一、历史的教训

历史上有不少漠視甚至輕視情报工作的事例。特洛伊国王普萊姆的女儿卡珊德拉，从她的追求者阿波罗那里得到了一项礼物——預言的才干。但是，据神話所載，一当她获得了这份礼物，她就轉而鄙棄她的追求者。阿波罗无法收回这份礼物，但他能够限制这点才干发挥作用；而且确实这样做了，那就是使人們不相信她的預言。因此，卡珊德拉关于搶夺海倫将会带来特洛伊王国的毁灭的預言，以及关于有名的特洛伊木馬——見于文献的最早的“情报工作”之一——的警告，都被人們忽視了。

另一次早期的情报活动見于聖經（民数記，第13章）。当摩西和以色列人流落在曠野的时候，耶和華曉諭他說，以色列每个支派中要打发一个首領去“窺探迦南地”，迦南地是耶和華賜給他們的安身立命之地。摩西遂指示各支派首領去“調查那是什麼样的地方，那里的人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他們用了四十天時間去执行这个任务。回来向摩西和亚倫报告說：“那里噴涌着奶汁与甘蜜，那里繁花滿枝、果实累累”等。执行任务的十二个人，除了約书亚和迦勒之外，十个人都說那里的人民比以色列人强悍，說他們是“魁梧强壮的人”，“城邑也坚固寬大”，“当下以色列众人向摩西和亚倫发怨言”。于是耶和華起誓，由于众人对他用心不誠，他們将在曠野流浪四十年，即按窺探那个地方和帶回那点胆怯消息所花的四十天，一年頂一日*。

• 此段及下段所引聖經原文均參照上海聖書公會1931年印行的《舊約全書》譯文。——譯注

這項特殊的情報任務有着比乍一看來更多的含義。首先，如果一個人要對以色列的土地和人民獲得一個公正無偏的概念，他就不應該派遣政治領袖去執行情報任務。他可以派出技術人員，而且肯定不應該是十二個，而應該是兩三個。其次，摩西和亞倫並不需要以色列土地方面的情報，因為他們相信耶和華。這次任務的實際目的並不是要了解以色列的土地是一種什么样的土地*，而是要了解以色列各支派的成員究竟是一種什么样的人民——強悍和值得信任否。只有兩個人通過了主的考驗，其他支派的首領和他們的人民則被貶黜在曠野中繼續流浪，直到一個新而更強悍的世代起來接替他們。

這四十年過去以後，約書亞派出兩個人進行“窺探”（約書亞·第二章），他們在耶利哥被接納到妓女喇哈家里。我相信這是現代情報工作行話“安全下處”見于文章里的第一個例子。接着，約書亞拿下了耶利哥并“把這城市和那里所有的人民徹底毀滅，只保存了妓女喇哈和她全家”。這樣就立下了一个傳統，即幫助情報工作的人應該得到報償。

整個上古時期，從賽魯斯大帝和他的波斯軍隊，到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和羅馬時期的凱撒，有效地運用情報和間諜工作，始終是軍事領袖成功的必需條件。普土司國王米斯拉達梯六世（公元前120年至64年）在小亞細亞之所以能頂住羅馬強敵，多少就因為他是一個出色的情報官，能運用二十二種語言和方言，又比遠來的羅馬人熟悉那些部族和他們的風俗習慣。

中世紀時，西歐各國的統治者都沒有什麼系統搜集情報的機構。他們都不大了解拜占庭王國和斯拉夫民族的情況；對穆斯林的情況，他們甚至了解得更差；而對中亞和東亞的任何情況則几

* 以色列的土地就是上述的迦南地。據聖經所載，以色列人原寄居埃及，因子孫繁衍甚眾，不容于埃及法老，耶和華乃命摩西率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去迦南，迦南是耶和華早先答應賜給以色列人的土地。——譯注

乎一无所知。馬哥孛羅(Marco Polo's)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中有一些战略情报性的材料，但沒有人認真注意它。意大利商人比任何其它阶层占有更多的东方情报，不幸他們很少有机会把它貢獻給那些决定欧洲的东方政策的人。教皇不滿意商人同異教徒作生意，帝王們又与这些商人沒有接触。中世紀欧洲最严重的政治錯誤，就是与东方的关系問題。

15世紀时，意大利人由于建立了固定的駐外使館而对情报工作作出了一項重大貢獻。在他們駐外使节的报告中，特别是駐威尼斯公使的报告中，含有許多战略情报。到了16世紀，欧洲大多数政府就都模仿意大利这个先例了。

在沒有地图的时代，地理就是一个問題。查清某条河上有一处淺灘，可能使一支部队突破重圍；发现一条山中小徑，可能打开一条突破敌陣的道路。通常可以动員土著居民提供这些情报，他們是沒有什么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緒的。路易九世就曾給一个占卜賽人好几千元，因为此人引导他穿过了尼罗河一条支流上的淺灘，从而使他得以向穆斯林軍隊发动一次奇襲。

在近代，我們发现，随着最初的情报专家的出現，間諜工作已发展成为一項重要的政治工具。这些专家就是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弗兰西斯·华辛汉爵士和伯雷勋爵，以及克倫威尔时期的約翰·特罗。这些大臣們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于搜集秘密情报。

二、美国历史上的教訓

但在美国历史上，直到最近都还没有什么关于政府情报活动的記載，只有战时是例外。幸亏乔治·华盛顿对秘密情报工作的价值、方法及其保密要求有明智的了解。他的保密工作确实作得很好，使我們至今都无法了解他的情报活动的全部历史。那桑·霍尔的故事是革命时期間諜活动最著名的事件——可不是成功的